

DAWN 简讯



中国
在全球南方的
性别影响

《DAWN 简讯》是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的定期出版物，展示该组织的最新分析、批评和评论。

DAWN 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改变了全球妇女问题辩论的方式。它对债务问题、社会服务恶化、环境退化、粮食不安全、宗教原教旨主义、军国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等相互关联的系统性危机进行持续的分析。这些分析深深根植于生活在南方国家的贫困妇女的经历之中。

《DAWN 简讯》是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出版的免费期刊，自20世纪80年代创刊以来，提供了传播这些思想的空间。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是一个由来自经济南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组成的网络，对全球议题进行女权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和性别正义。

目录



5 南方女性主义关于
全球中国的知识的共同生产

● 蔡一平



11 中国发展合作
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妇女的影响

● 安妮塔·蒙图特、杰奎琳·拉瓜迪亚·马丁内斯、
黛博拉·麦克菲



16 中国的参与在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影
响：汤加和瓦努阿图的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项目案例研究

● 瓦塞马卡·鲁图



20 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中国矿业项目：
性别影响和妇女的能动性

● 戴安娜·卡斯特罗·萨尔加多



24 津巴布韦比基塔 (Bikita) 锂矿对性
别和环境的影响

● 希比斯特·卡萨和辛齐勒·芬古



28 赋权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女性：评估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对女性小农户生计、能力建设和社会规范转变的影响

● 李明德



33 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对妇女、和平和安全的影响：对中国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和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的比较案例研究

● 帕特里夏·桑戈·波拉德



37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软实力参与中的性别问题

● 高文·克尔卡尔和丽都·阿格瓦尔



41 民间社会抗争全球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跨国民间社会针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倡导行动中的性别问题

● 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



南方女性主义 关于全球中国的 知识的共同生产

● 蔡一平



背景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对于这个议题的研究兴趣和媒体报道也逐渐增加，主要聚焦在中国的海外投资，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在全球地缘政治和地区动态背景下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和人权影响。然而，性别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领导人最近重申了其在全球层面对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承诺，包括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供资金，以落实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第五条，而且，在中国的国际合作政策文件《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中首次提及了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

自2022年起，DAWN与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分析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互动合作所带来的性别影响。参与这个探索性研究的有来自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多学科背景的学者。这八个案例研究探讨了中国参与全球南方事务多层面的深刻影响，以及包括国家、企业、民间社会和地方社区在内的各个部门如何应对这些影响。

知识的共同生产以及 南方女性主义批评——案例研究

↑

DAWN 开发了一个分析框架来指导这项研究。该框架回顾了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全球参与轨迹：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实施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中国加速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以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和新开发银行 (NDB) 或金砖国家银行的启动，中国正在进行的全球扩张。DAWN 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体现在三个不同且相互关联的方面：(1) 中国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并在联合国系统等多边机制中发挥作用；(2) 通过发展融资、援助和贷款，重塑国际发展合作格局；(3) 创建新的双边和多边倡议和机制，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GDI)、中非合作论坛，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等。DAWN 还考察了当代中国国内外的性别政治和女权主义活动。在国家层面上，致力于促进两性平等的国家政策与持续存在的两性不平等之间存在矛盾。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全球参与的话语和实践之间存在差距——国际发展合作等政府文件中阐述了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原则，然而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指导方针在发展合作项目的具体实施中尚显薄弱，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DAWN 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性别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共同造就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有诸多的参与者，它们在其中不断采取行动、进行互动和争论；因此，要理解这种性别影响，必须要在不同的地点做即时和全面评估，尤其是需要基于全球南方的现实来做出评估。作为一个立足于全球南方的女权主义网络，DAWN 坚信，全球南方妇女的观点和经验应该是这些分析的中心，这只有通过对话、协作和

团结才有可能。

在过去两年中，DAWN 与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合作进行了八个案例研究，本期《DAWN 简讯》就是这些研究的摘要。每个案例研究都在区域或国家背景下探讨了的一个或多个以下问题：

- (1) 性别在中国的全球参与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 (2) 中国的投资和援助项目如何影响当地社区的性别平等、妇女的生活和人权？
- (3) 作为一个“新角色”，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发展项目在性别政策和性别相关影响评估方面是否与传统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有所不同？如果是这样，有哪些不同？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
- (4) 南方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如何应对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如何加强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倡导，并实现社会和环境正义？

↑
这项合作研究的目的是挑战那种以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定义中国全球参与的狭隘框架，从而摆脱西方的种族主义和对知识生产的霸权和控制。这些案例研究通过审视中国的全球足迹的不同方面，为全球中国的知识领域，特别是在其性别影响方面，作出贡献。这项研究还旨在要求南方和北方各国的国家和企业部门对维护妇女和南方人民的人权和福祉尽到责任。

这些现实的案例和在地的实证研究聚焦于地方与全球的联系并优先考虑自下而上的方法，它们对有关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宏观叙事提出了挑战。这些论文涵盖了广泛的相关主题，包括中国的软实力；妇女、和平与安全议题；民间社会的倡导行动；采矿业、基础设施和农业投资。它们考察了相关的各个部门——从国家、商业部门和金融机构，到传统捐助者和国际发展机构，到当地社区、民间社会、妇女组织和土著群体。同时，这些研究描述了中国全球足迹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以及这些参与如何构成了缔造新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这些研究都将妇女的能动性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而不是仅仅将妇女视为被动的受害者或弱势群体。它们在问责中国的国家和商业行为主体的同时，也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从而加强与中国和其他发展行为主体的谈判能力。这种探索性研究挑战了中国的崛起导致南方国家作为受害的单一形象，这种形象经常带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和黄祸叙事的偏见，因此，这种探索性研

究探讨了建立新的南南关系的可能性。作为国际发展领域的一个新的参与者，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交往不应该只是加强旧有的困扰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捐助者 - 受援者依赖综合症。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它应该放在中国发展合作的重要议程上，并且要配置适当的操作方针和充足的财政资源。这种做法不应被视为与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相矛盾。这些案例研究表明，作为接受发展援助的国家，应当成为积极的推动者，它们有责任在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发展伙伴执行的发展合作项目中促进本国的性别平等议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重新构想南南关系和进行有意义的跨国女权主义对话。

展望未来

↑ DAWN 认为这个研究项目为南方女权主义协作进行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例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对相关主题进行对话、批评、辩论和反思的空间，而不是强求某种共识。例如，学者们经常在“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方法论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还有，当一些中国参与支持的项目甚至还没有实施就被叫停时，该如何评估该项目的影 响。以及一些概念和范畴是否可以在不考虑适当的背景和进行加之问题化的情况下就挪用于中国，例如新殖民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新帝国主义和北京共识，等等。DAWN 也认识到，这项研究的主题——全球中国——这一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它需要女权主义持续不断地进行合作加以分析，以了解其复杂的机制。

这项研究是在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进行的，由于疫情导致的封控措施、流动性困难和财力的限制，研究人员很难前往现场收集第一手的实证数据。一些研究人员表示，他们难以采访到关键信息提供者以获取需要的数据，以及跟被采访对象缺乏必要的沟通，这使他们感到沮丧。此外，当前的地缘政治和中国与西方之间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可能使任何有意义的对话变得不可能，甚至无关紧要。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都是共同的挑战。因此，南方女权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女权主义之间的南南合作对话和团结是否能够消解厌女症、父权制、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否能够让我们重新构建一个以人权、尊

严、自决，以及性别、经济和生态正义为核心的女权主义议程？ DAWN 诚挚地邀请南方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携起手来，共同思考，探索答案。 🌟

参考文献

M. J. 亚历山德尔, C. T. 莫汗蒂 主编,《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民主未来》。路特里奇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蔡一平、于音 著,《中国的参与对全球南方的性别影响的分析框架》。苏瓦: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讨论文件第 47 号。2022 年出版。[[链接](#)]

李静君 著,《全球中国二十周年: 为什么、怎么样、又如何?》, 载于《中国季刊》第 250 期, 2022 年 6 月, 第 313-33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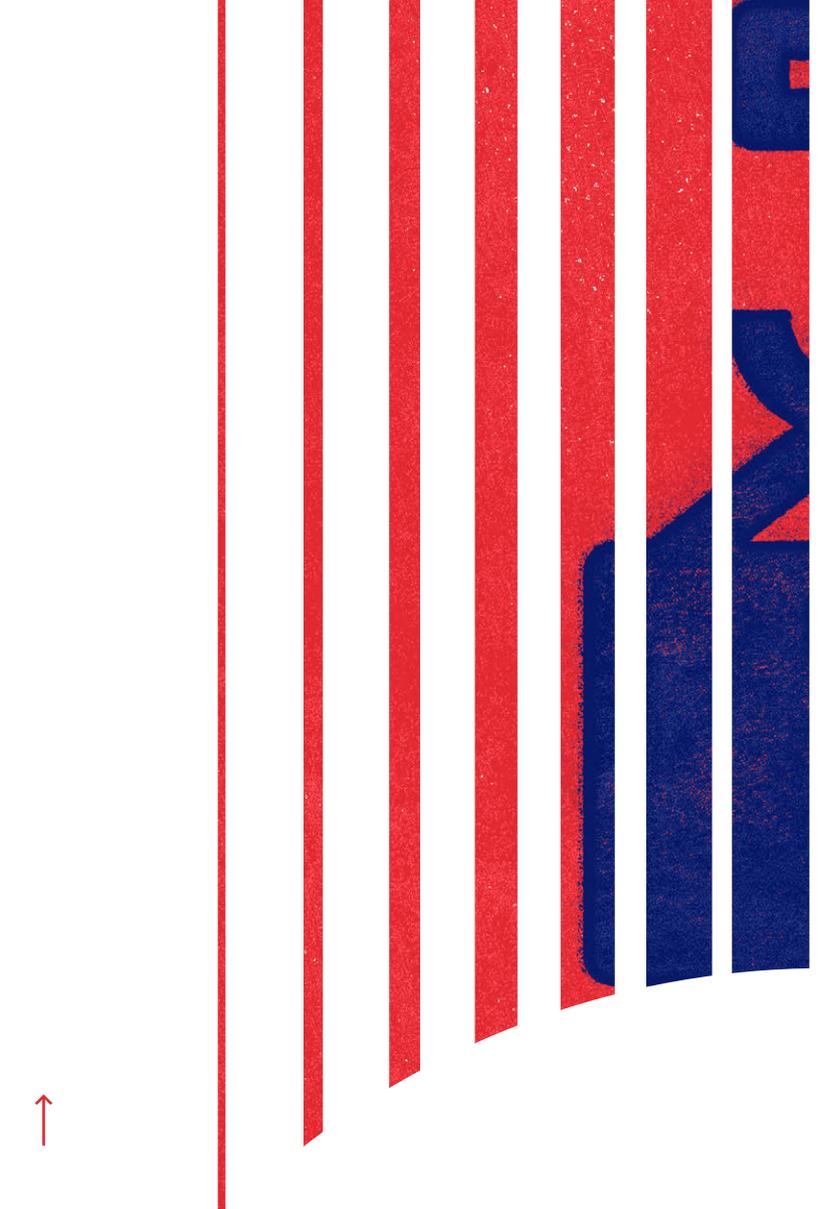
罗丽莎、罗鹏 主编,《世界新秩序: 中国和南方国家》。杜克大学出版社 2022 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2021 年 1 月。[[链接](#)]



蔡一平

蔡一平是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 (DAWN) 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她与 Vanita Mukherjee 共同主持 DAWN 的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 (SRHR) 的主题分析团队。蔡一平曾任职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2006-2008 年) 和《中国妇女报》(1995-2005 年), 撰写了大量关于妇女人权与发展问题的文章。她的研究重点是跨国女权运动, 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女权运动, 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 媒体和传播。她于 2013 年至 2016 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亚太民间社会咨询小组成员, 也是 2014 年 5 月成立的亚太民间社会组织区域参与机制的顾问。她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全球与国际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研究主题为性别与全球中国。



中国发展合作 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妇女的影响

- 安妮塔·蒙图特
- 杰奎琳·拉瓜迪亚·马丁内斯
- 黛博拉·麦克菲

在关于中国和加勒比地区关系的研究中，妇女和性别问题很少受到关注。鉴于学术文献和政策实践中关于中国 - 加勒比地区合作的性别盲点，本文通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 e TecK Phoenix Park 工业园区和库瓦医院 (Couva Hospital) 的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作中的妇女问题。为了进行这项探讨，我们提出了一个指导性问题：中国发展合作项目对妇女的影响是什么？即，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作是增进了妇女赋权？抑或削弱了妇女赋权？通过研究具体项目并聚焦社区和妇女，本文倾向于采用协作性、跨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等级制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合作。

为此，本文承认妇女的权利是人权。保护这些权利需要针对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特殊位置和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发展措施。我们认识到妇女 (women) 和性别 (gender) 并非可以互相调换的概念；一个不能代替另一个。在这里，妇女用来代表那些生理上是女性的人，而性别被理解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建构。我们试图分析性别的建构过程来理解妇女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加勒比地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也影响着加勒比地区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为了确定中国的发展合作如何在加勒比地区增进或者削弱妇女赋权，我们首先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的发展合作的一般性方法，以确定其与加勒比地区合作的政策框架。我们采用了基于解释主义范式的定性研究方法。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作为一个男性主导的行

业，伴随随着的是中国男性工人的流动，人们并没有观察到女性就业与中国资本流入该国之间的明显相关性。必须指出，尽管一些妇女在许多公司中担任着管理职务，但该行业仍然主要由男性主导。

对两个中国发展合作项目影响的分析显示，民间社会组织和活动，在有关妇女的议题上参与有限。在 e TecK 工业园区的案例中发现，园区并没有将那些传统上由妇女来运营的业务作为招商重点。工业园没有进行性别需求或影响分析，也没有在设计项目时专门考虑妇女的需求。这两个案例中，都没有考虑到加勒比地区妇女在职场面临的双重角色，即在工作同时还要承担照料劳动，她们的性别需求并未纳入项目的规划之中。

本研究并未发现中国资本流入与女性就业之间有明确的相关性，特别是在工业园区的案例中。这个项目没有专门针对妇女的就业，也没有试图将更广泛的劳动中的性别议题和不平等问题纳入合作过程中的指导原则。尽管工业园为微小型企业提供了空间，这些企业往往有很多女性参与，但这并不是出于一个有意识的策略，也没有在招商过程中有意吸引由女性拥有和运营的企业，或促进妇女创业的可能性。

然而，在库瓦医院的案例中，很明显，妇女从医院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中受益匪浅，其中许多服务都是妇女及其子女非常需求的。该医院设有护理培训设施，这些设施也大部分是提供给女性使用，因为护理职业以女性为主。

基于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在政策立场上支持性别平等、妇女赋权和妇女的主体性之外，还有必要将这一点转化为他们的国际发展合作战略。中国应该在其发展合作中实践性别主流化作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战略方法。在项目的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过程中，中国应该通过评估发展需求，并确保发展合作倡议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个项目中的工人主要是男性。因此，一般的服务，例如安全、清洁的洗手间设施，是提供给所有人的，其中也包括女性在内。没有规定男女之间工资的平等或为在职母亲提供日托设施，以改善女性工人的工作条件。

在执行这些项目时，考虑到了采取安全措施确保妇女能够安全获取服务，而不会

危及她们的身心完整性。例如，确保项目能够让妇女更安全地使用卫生设施、修建人行道和安装路灯，让妇女能够获得信贷服务和托儿服务，这些都是重要的。

在实践中，中国要促进发展合作中的性别主流化，必须在与受援国的谈判阶段就开始。所有各方都应参与到促进性别平等、赋权妇女和女孩的工作中，同时也要考虑到该国和该地的具体情境。在合作项目中，中国的发展合作机构和协调人员应该鼓励妇女作为政治对话的对等的一方，积极参与到从规划到监测和评估的全过程中去。

虽然中国应该担当这一责任，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加勒比国家政府应该只承担着被动的或者次要的角色，而有赖于中国来采取所有行动或者大部分的行动。这种立场只会加剧传统上困扰着加勒比地区（以及全球南方其他地区）发展伙伴关系的捐赠国 - 受援国依赖综合症。我们将加勒比地区定位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它们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执行与中国相关的发展项目时，完全有能力塑造和影响项目的性质和内容。 ■

参考文献

鲁本·冈萨雷斯-文森特、安妮·塔蒙图特 著（2020年）《加勒比视角下的中国 - 加勒比关系：全球国际关系、依赖性和后殖民条件》，《第三世界季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链接\]](#)

简·帕帕特 著（2014年）《探索国际发展机构中性别主流化的变革潜力》，《国际发展杂志》第26卷第3期，第382-395页。



安妮塔·蒙图特

安妮塔·蒙图特(Annita Montoute)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大学(UWI)圣奥古斯丁校区国际关系研究所(IIR)的高级讲师兼代理主任。她曾担任发展政策管理欧洲中心的研究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加勒比对外关系以及中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她拥有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教师,拥有亚瑟·刘易斯爵士社区学院的教育研究生证书。



杰奎琳·拉瓜迪亚·马丁内斯

杰奎琳·拉瓜迪亚·马丁内斯(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博士是西印度群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师。此前,她曾担任哈瓦那大学副教授和胡安·马里内洛古巴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她曾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演讲,并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欧洲讲学。她是哈瓦那大学“诺曼·吉尔万”加勒比研究中心成员,也是CLACSO“大加勒比地区危机、解决方案和替代方案”工作组协调员。



黛博拉·麦克菲

黛博拉·麦克菲(Deborah McFee)自2005年起在西印度群岛大学圣奥古斯丁校区性别与发展研究所工作。自1998年以来,她一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英语加勒比地区从事性别与发展领域的工作。黛博拉参与了三项加勒比地区国家性别政策的制定,并与米歇尔·罗利教授共同编辑了《加勒比性别研究评论》(CRGS)2017年特刊,题为“工具还是武器? : 加勒比地区的政策制定、性别公正和社会变革的政治”。她在同行评议的期刊发表文章,研究议题涉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性别政策和政策制定,重新思考加勒比地区的性别主流化,以及卢旺达种族灭绝后的妇女、性别、人类安全和国家性别政策。2011年,她担任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的客座研究员,在性别与人类安全,以及强奸作为反人类罪方面开展研究。黛博拉拥有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全球治理与人类安全系、麦考马克公共政策与全球研究研究学院的博士学位。

↑

中国的参与在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影响： 汤加和瓦努阿图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项目案例研究

● 瓦塞马卡·鲁图



↑ 本研究的目的是全面分析中国在两个太平洋岛国（PICs）——汤加和瓦努阿图的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参与情况，尤其关注的是这些项目对性别的影响。

在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汤加和瓦努阿图都签署了《北京行动纲领》，并通过了《太平洋地区领导人性别平等宣言》。在国家层面，汤加和瓦努阿图都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纳入了国家性别政策和框架，例如汤加的《国家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和《2016年至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在全球层面，这两个国家也采纳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此同时，中国在2015年重申了其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承诺，并随后颁布了十年计划，即《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作为其推动性别平等的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已崛起为发展领域中一位重要的新参与者，通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丰厚的贷款来资助项目。海陆空交通对于太平洋岛国在追求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方面至关重要。这些小岛屿国家通过多边和双边协议寻求捐赠伙伴的支持，以获得资金和技术，用于道路、机场、港口、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相关项目的扩建、建设和维护（奈度，等，2022）。因此，十个太平洋岛国与中国签署了双边谅解备忘录，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即巴布亚新几内亚、纽埃、萨摩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库克群岛、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汤加和瓦努阿图（李，2022）。实际上，中国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一个平台，参与的太平洋岛国现在是重要的贸易和经济伙伴。

汤加和瓦努阿图这两个案例国家由于多年累积起来尚未偿还的优惠贷款，都成为了中国的主要债务国。这两个国家都遭受了灾难性的自然灾害。2022年1月，汤加遭受了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而瓦努阿图则在2023年2月和3月连续遭受两次飓风袭击——这两次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人员伤亡并严重破坏了房屋、建筑物、道路、桥梁和通讯线路等基础设施。中国迅速回应了这两起事件，提供了医疗用品、食物、基本生活必需品、水箱、临时集装箱住房和帐篷，并派遣医疗人员。除了在这些国家实施其他“一带一路”项目之外，中国还重新修复了因灾害而受损的各种基础设施部分。

改善基础设施在实现性别平等目标和增强妇女经济和社会赋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它提供了就业和商机，基础设施一旦完工，它改善了生计和生活质量。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在太平洋岛国的开展，发展伙伴继续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带入这些项目中来促进性别平等。在汤加和瓦努阿图，发现中国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且，尽管中国已经承诺促进性别平等并确保妇女权利，但是在“一带一路”项目似乎还没有制定出能够帮助实施其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的操作指南。

研究发现，在两个太平洋岛国中，政府之外的行为者（如公民社会组织）的观点表明，尽管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可及性方面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妇女并没有直接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受益。妇女往往以提供支持服务的形式扮演着间接的角色，例如提供餐饮和清洁服务。中国通过文化交流或“软实力”的援助为教育和技术培训机会打开了大门，这些机会通过奖学金和资助的形式提供。此外，一些主要的观察家承认，这些机会还包括了为妇女举办能力建设工作坊、向妇女捐赠物品（如笔记本电脑）和为她们进行基于社区的培训。然而，他们并未了解到在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有任何关于性别发展的做法。

来自两个岛国的观察家也重申，中国提供的资金是“政府对政府”的合作；因此，另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机构与那些评估性别影响以及将资金和资源分配给预期受益者的情况的公民社会组织、妇女团体之间的沟通不足。此外，中国在确定向公众提供援助的优先领域时缺乏透明度，这也阻碍了对项目的影响进行明确的评估。

另一方面，诸如澳大利亚外交部（DFAT）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发展伙伴在

汤加和瓦努阿图的基础设施项目中都制定了性别发展框架以指导其运作。然而，一些观察家对这些性别发展项目的效果表示质疑——它们在实施阶段和项目后续过程中是否对当地社区和妇女团体带来可持续性，以及这些性别项目是否从长远来看真正惠及妇女。

为了帮助弥合这些差距，中国在实施其“一带一路”项目中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将项目服务的可及性和透明度纳入性别平等操作指南和项目实施中；重新审视在其项目中包含妇女的主体性和妇女发展议题的紧迫需要；允许与当地的政府以外的行为者（如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妇女团体和其他边缘群体）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和对话。此外，太平洋岛国必须积极参与将性别平等置于基础设施发展需求的前沿，并与中国和其他发展捐助国密切合作，以促成在这一关键领域的亟需进展。 ▲

参考文献

↑ 卡罗尔·李 著（2022年）《大洋洲的“一带一路”倡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参与》，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亚洲研究系，2023年2月15日浏览，[\[链接\]](#)

V. 奈度；瓦塞马卡·鲁图；C. 阿希 著（2022年）《太平洋地缘政治和基础设施发展区域报告：为PANG（太平洋全球化网络）撰写的四国研究》，斐济苏瓦（尚未公开发表）。



瓦塞马卡·鲁图

瓦塞马卡·鲁图（Vasemaca Lutu）是斐济的独立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是太平洋岛国的发展研究。她此前的研究项目的一些重点关注领域包括贫困、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发展的地缘政治、以渔业部门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和预警系统、与儿童保护、残疾、家庭暴力、性别主流化、气候变化以及职业健康和安​​全有关的工作场所政策。她还是位于斐济第二大岛瓦努阿岛的“Bia i Cake 妇女合作社”的成员，这是她所在村庄的妇女团体，其使命是“通过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建立替代性生计”。她拥有瑞典马尔默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硕士学位，目前是斐济瑙索里南太平洋航空培训学院（SPATI）的见习飞行员。



厄瓜多尔和秘鲁的
中国矿业项目：
性别影响和妇女的
能动性

● 戴安娜·卡斯特罗·萨尔加多

采

矿活动以多种方式改变着社会，然而这些转变对女性的影响往往更大，因为女性与自然直接相关，并负责照料生命。本研究旨在探讨秘鲁 Las Bambas 和厄瓜多尔 Rio Blanco 矿业项目对当地社区妇女的影响，以及这些妇女在捍卫自然和土地方面的能动性。我们访谈了位于矿业项目所在地的妇女，并回顾了過去五年中国国际矿业最为相关的行业指南，以评估是否存在与性别或妇女相关的具体保障措施。

这两个采矿项目分别自 2014 年和 2013 年以来一直由中国企业控制：Las Bambas 由 MMG 矿业有限公司控股，该公司的主要股东是中国五矿集团公司；Rio Blanco 由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 (Ecuagoldmining) 控股，该公司由中国公司庄胜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Junefield Gold Investments) 拥有。在这两个案例中，都存在着潜在的环境和社会冲突，妇女在抵制这些公司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尽管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中国矿业公司的行为与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没有明显不同 (瓦尔德里和莱姆斯，2019 年，第 398 页)，但其他人认为，中国公司的经营证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有一些特殊性。根据鲁本·冈萨雷斯 - 文森特 (Rubén González-Vicente) 的说法，中国在海外的矿业投资有三个特点。首先，中国企业不同于私人股东和要在短期内盈利的要求，相对更加独立。其次，中国企业在进行矿业收购的同时，还要对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合同进行谈判，这使它们能够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联盟或财团，并控制供应链。第三，从中国企业的表现来看，它们自己并没有准备好应对当地社区在透明度、问责制和人权方面的要求，而且它们缺乏有效的尽职调查、全面的风险评估、对话和赔偿机制。

过去几年，随着中国企业变得更加国际化，中国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发布了越来越多的指导方针，越来越多地提到遵守国际协议和标准，以促进在海外经营的企业取得良好业绩。尽管在最相关的国际业务指导方针中，专门有关性别的内容基本上是缺失的，但是采矿业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CCCCMC）发布的一系列指南。遗憾的是，这些指南并不具有约束力，这在文字叙事和实际执行之间造成了很大的差距。拉丁美洲的情况，特别是本研究中所分析的项目，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多维的视角（安德森，2022年）来看，我们认为，基于性别的暴力及其影响发生在不同的领域，如经济，环境，政治和社会文化。这两个案例研究表明，在经济领域，采矿项目改变了土地所有权掌握在男子手中的农业结构。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妇女获得生存和照顾的基本资源（农作物、水和食物）和服务（住房、安全和健康）。妇女作为生命和社区的守护者，还承担着修复或重建那些失去的东西的额外负担（佩雷斯、德拉普恩特和乌加尔特，2019年）。

↑ 在环境领域，水和土地资源的破坏和污染影响着妇女，这些资源是家庭和社区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这影响到她们日常承担的照料工作，也影响着她们的健康和社区的健康。在政治领域，妇女，特别是女性领导人和倡导者，在冲突和抵抗过程中受到迫害、威胁和刑事定罪。她们因发声和参与而受到歧视和羞辱。此外，有证据表明，与公司和政府结盟的公共部队和私人警卫过度使用武力。在社会文化领域，主要的影响是社会、社区和家庭结构的破裂。在这种背景下，被研究的中国矿业公司往往利用国家的弱势存在，通过经济补偿机制、谈判策略、以及破坏社会凝聚力和造成社区两极分化的社会服务，来控制人口和土地。

我们还发现，采矿活动为女性领导人和女性社会运动的出现和巩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女性积极发挥了她们的能动性，重新配置社会环境和占领新的社会空间，从而开展行动改变她们所处的社会秩序或惯例，在历史上妇女往往被排斥在这些行动之外。例如，在 Rio Blanco 案例中，女性创建了“Sinchi Warmi”组织，她们的抵抗活动是让矿业公司采取保护措施和最终在2018年暂停采矿活动的关键。在 Las Bambas 项目中，女性领导人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并且妇女组织在地方和政府机构中进一步阐明了以性别为焦点的权利议程，这一做法使得妇女组织得到了加强。

在这两个案例中，正如瓦尔德里(Valderry)和莱姆斯(Lemus)(2019年，第404页)指出的那样，这些抵抗运动“提出了一种理解人类、工作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同模式”。因此，它们对历史上支撑跨国采矿活动的采掘型父权制模式的提出了一种范式上的挑战，而中国现在正是这跨国采矿活动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K. 安德森 著 (2022年)《在危机中构建力量：女性对采掘业的应对》。SAGE 基金。[\[链接\]](#)

L. M. 佩雷斯; L. 德拉普恩特; D. 乌加尔特 著 (2019年)《矿工的照顾者：科塔班巴斯的性别和大规模采矿》。研究论文第12号。利马：太平洋大学。[\[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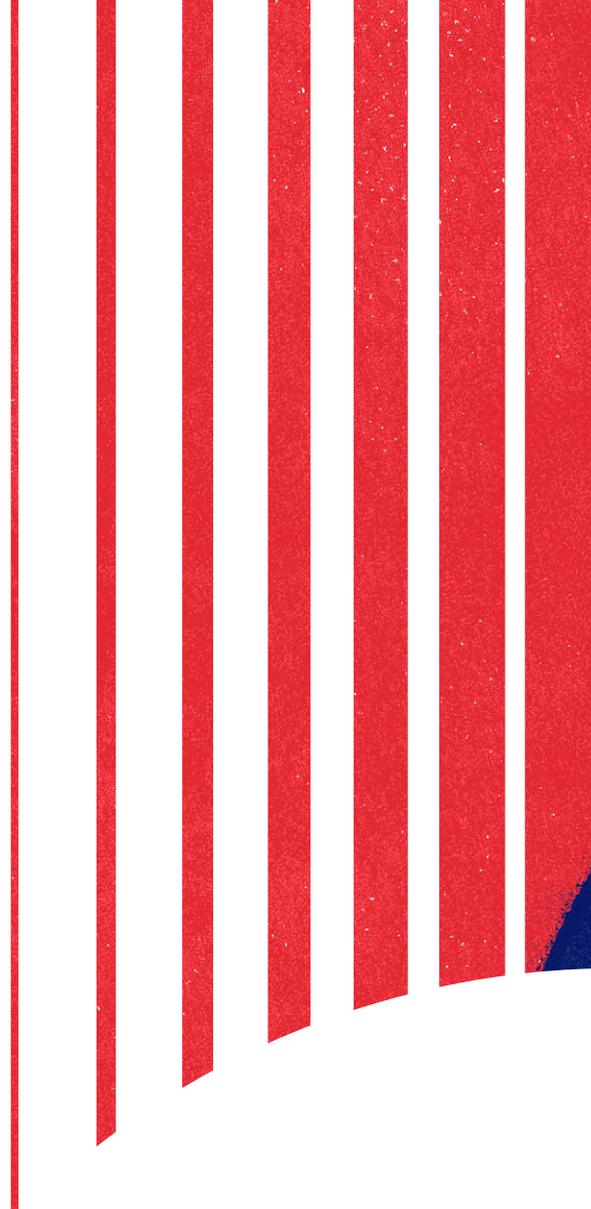
W. 萨赫尔 著 (2017年)《中国在安第斯山脉的大规模采矿：对厄瓜多尔“公民革命”的剥夺和财富积累》。基多，阿布亚-亚拉出版。[\[链接\]](#)

F. J. 瓦尔德里-维亚尔; D. L. 莱姆斯-德尔加多 著 (2019年)《矿业、社会运动与中国在拉美的扩张》。《挑战》31 (2)，第375-410页。[\[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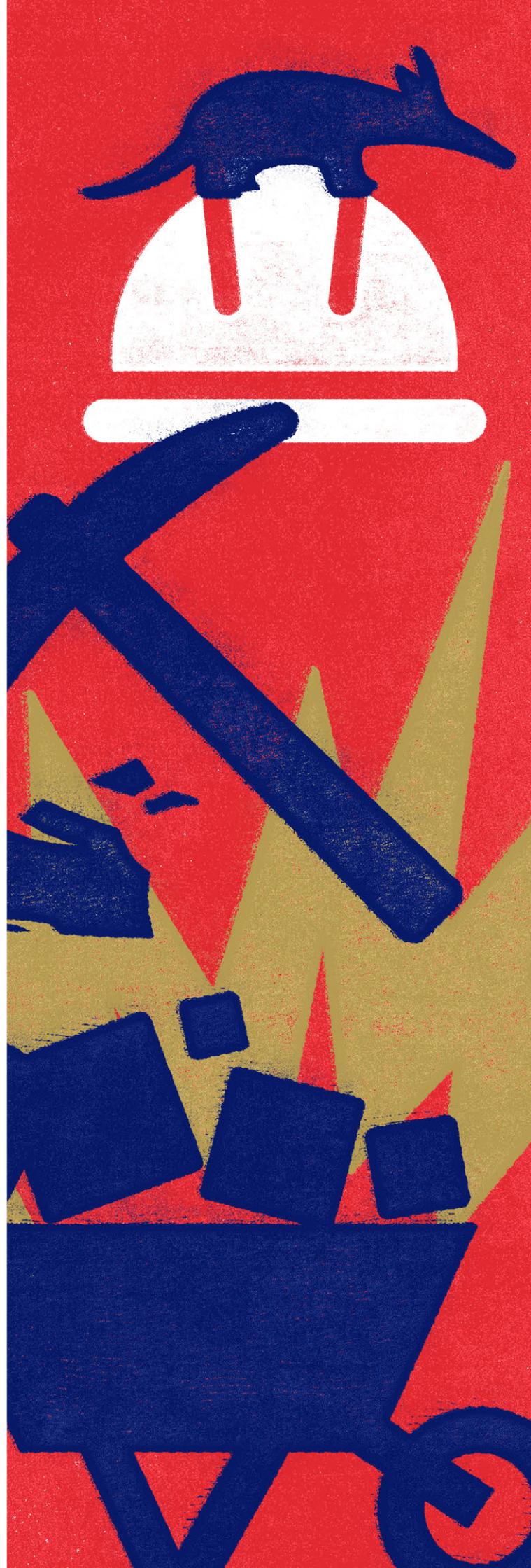
黛安娜·卡斯特罗

黛安娜·卡斯特罗 (Diana Castro) 是拉丁美洲可持续发展组织 (Latinoamérica Sustentable, LAS) 的研究员，该组织是厄瓜多尔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支持中国在拉丁美洲投资背景下保护环境和当地社区。黛安娜是拉丁美洲研究项目的博士研究员，拥有厄瓜多尔的安第西蒙玻利瓦尔大学 (Universidad Andina Simón Bolívar-Ecuador, UASB-Ecuador) 的国际发展合作硕士学位。自2014年以来，黛安娜一直研究拉丁美洲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融资机制。她的博士研究追踪了这些项目对国家、环境和当地发展的制度能力的影响，并深入研究了厄瓜多尔的案例。黛安娜发表了多篇文章和一本关于这些主题的书。她还曾在厄瓜多尔多所大学工作，并参与了关于中国在拉丁美洲相关性的国际研究计划。



津巴布韦比基塔 (Bikita) 锂矿对 性别和环境的影响

- 希比斯特·卡萨
- 辛齐勒·芬古





掘业，从本质上，是指全球贸易和交流中的不平等关系，导致资源被采掘的国家所获的价值份额较低，却承担着更大比例的环境、健康和劳动成本。这依赖于对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控制，这种控制依赖于使用暴力来剥夺，并使被剥夺的人一直处于贫困和被排斥的条件下。采掘业的真实成本的这种不成比例分配，实际上在为矿业公司及其开展采矿活动所在的国家提供补贴，它们都受益于糟糕的监管环境、廉价的劳工制度和无偿的照料工作；矿区所在的社区（以及这些社区中的妇女）处于采掘业的最前线。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全球北方国家和企业受益。随着中国的公司迅速从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转移到全球经济的中心地带，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在复制这些关系，还是采取了不同的运作方式（李静君，2017年）？我们选择对津巴布韦的 Bikita 地区进行案例研究，这个案例使得我们能够分析在该地区日益显现的能动性、阶级和性别关系。

津巴布韦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本土化政策旨在重新配置其所有权和控制权，以纠正殖民化和种族隔离带来的历史不公正（莫尤、耶罗斯，2011年）。这些措施也与学生和工会反对自由化的抗议活动相结合（赛顿、泽伊利格，2005年；索尔、桑德斯，2005年）。针对津巴布韦的侵犯人权、政治迫害和破坏民主政体和法治的行为，一些国家对津巴布韦实施了制裁（英国政府，2022年；加拿大全球事务部，2023年）。这些不断加剧的危机限制了津巴布韦获得发展融资和投资的机会（丹德雷，2022年）。作为一个替代性的发展伙伴，中国是一棵救命稻草。

中国政府坚定地 与津巴布韦站在一起，共同追求“独立的发展道路”这一事业，两国都有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相似历史，都谋求作为国际舞台的外围国家尽快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成果。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强调，这些投资是“重振西方企业长期闲置的资源”（郭少春，2022年）。尽管有这些意愿，但仍有报告称存在侵犯劳工权利的现象，并缺乏与所在社区的社会沟通，这些社区基本上仍然被排除应获得的利益之外，而这些利益主要都被国家以及那些靠近公共机构的政治精英所获取。

这项研究的田野工作利用了2019年至2022年间在津巴布韦马斯温戈省的比基塔（Bikita）收集的数据。我们与二十名妇女开展了焦点小组讨论，并使用雪球抽样法确定了十名女性进行了单独访谈。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inomine Resource Group) 已向津巴布韦的比基塔矿投资了3.8亿美元, 该矿的锂储量为1100万吨, 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床。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Mineral Resources) 最初开采的矿物主要是用于陶瓷和玻璃生产, 现在已经扩展到电池原料。自2005年以来, 在津巴布韦已经有80多家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公司是其中之一, 市值达104.5亿美元。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都通过了新的《国家矿产开发政策》。然而, 这一政策仅仅考虑了妇女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以及妇女在与采矿业价值链方面相关的角色。虽然这与《非洲矿业愿景》相一致, 但这种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 它并没有明确解决矿业运行的全周期过程中的同意权问题(而不仅仅参与咨询)(肯涅, 日期不详)。

津巴布韦比基塔地区的锂矿开采与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密切交织,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冲突, 而土地冲突中, 妇女首当其冲受到不利影响。比基塔的妇女面临着由采矿业活动产生的多重挑战, 这些活动对矿区所在社区的影响甚巨。比基塔的手工锂矿开采也再次复制了那些在脆弱环境中进行大规模采矿业所面临的挑战。对土地使用的限制、水资源短缺、边界争端和社会问题, 这些已有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总而言之, 这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社会再生产工作负担、粮食不安全, 并削弱了妇女的身体自主权。

由于锂矿的开采过程和土地冲突, 农业生计极易受到极端天气条件和环境污染的影响。比基塔是一个农村地区, 实施土地再分配后, 人们被重新安置成为小农, 这一地区提供了津巴布韦在寻求通过自主发展道路克服持续危机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案例研究探讨了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运营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 尽管中国的投资对于提高津巴布韦的生产力和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妇女在矿业活动中所经历的排斥、边缘化和暴力仍然存在。采矿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增加了社会再生产工作的负担。像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公司有必要制定包容性政策, 特别是在比基塔脆弱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下, 克服采矿业中固有的边缘化和排斥就更为紧要。这应该从与社区参与开始做起, 以了解社区的优先事项和关注, 特别是倾听妇女的意见, 而且, 企业社会责任干预措施不应该仅仅就事论事, 或者流于表面的形式, 因为这样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确保矿业公司的稳定运营, 而是应该采取措施确保包容性、公平性以及改善环境和达成良好的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

- C. 丹德雷 著(2022年)《津巴布韦：制裁的长期阴影》。6月29日。[\[链接\]](#)
- 郭少春(2022年)《中国永远是津巴布韦发展道路上的真正朋友》。[\[链接\]](#)
- 李静君 著(2017年)《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工和外国投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S. 莫尤、P. 耶罗斯 著(2007年)《干预津巴布韦问题和两个左翼》，载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5卷第3期，第171-204页。
- D. 赛顿、L. 泽伊利格 著(2005年)《非洲政治经济评论》，第32卷，第103期，载于《帝国主义与非洲社会形态》(2005年3月)，第9-27页。
- B. 悉尼、J. 佩蒂特、S. 鲍德温 著(2023年3月9日)《为什么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津巴布韦的锂产业上》[\[链接\]](#)
- 英国政府《津巴布韦金融制裁》，2022年3月18日。[\[链接\]](#)
- G. 肯涅 著(日期不详)。《了解说不的权利》。[\[链接\]](#)



希比斯特·卡萨

希比斯特·卡萨(Hibist Kassa)是莱斯特大学环境未来研究所的政策界面研究员。她是南方农业网络研究公报的副主编，该网络是一个由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人员组成的洲际网络。希比斯特获得了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她拥有加纳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以及政治学、地理学和自然资源开发学士学位。她在非洲女权组织和政策研究机构任职十余年，曾经是DAWN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她目前正在撰写关于小商品生产以及手工和小规模采矿的书，该书即将出版。她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议题涉及手工采矿政策、土地、社会再生产、非洲的帝国主义和冲突、以及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学。



辛齐勒·芬古

辛齐勒·芬古(Zinzile Fengu)是一位充满热情的研究员和独立顾问。她拥有津巴布韦卢帕内州立大学语言和传播学士学位、监测与评估特别荣誉学位，并获得了发展学硕士学位。她在人权领域工作了超过12年，在创伤治疗、游说和倡导，以及女权运动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目前正在攻读发展学博士学位，她的论文研究重点是津巴布韦的女权主义组织。她的研究兴趣是从女权主义视角分析环境问题、采矿业、生计、灾害管理以及性和生殖健康权利。



赋权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女性：评估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对女性小农户生计、能力建设和社会规范转变的影响

● 李明德

近年来，中国与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包括建立了各种政府间组织、合作伙伴关系和不断增长的投资。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合作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也包括农业领域的合作。农业对尼日利亚至关重要，尼日利亚政府意图通过将本地经济多样化来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从而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中国在解决粮食安全和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使其成为尼日利亚农业发展的宝贵合作伙伴，因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都希望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在2003年至2014年期间，尼日利亚的三十六个州各自接待了约650名中国农业专家，他们提供了至少两年的农业相关问题培训和技术援助（世界粮食和农业组织，2019年）。2017年，中国的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Tidfore Heavy Equipment Group）在尼日利亚农业部门投资了约2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2023年）。这些投资遵循了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包括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ATDC）和成立具有股权合作伙伴关系的合资企业，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和奖学金，以及土地投资。尽管存在这些合作模式，但我们对小农户如何从这种合作中受益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检视了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GAWAL）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从2016年至2019年开展的中国政府资助的农业培训。本研究着重评估了女性小农户从这些培训中的受益情况，并探讨了这些培训对尼日利亚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和性别规范的影响。

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农业合作对女性小农收入水平和生计的影响。它探讨了监督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当地中国农业企业如何通过培训和与尼日利亚社区的商业交流来实施农业援助。本研究参考了现有的文献、媒体文章、政策报告、性别研究，以及对在阿布贾参加过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的主要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本研究旨在将培训内容的分析与受培训者的访谈相结合，将理论视角与现实经验相结合，提供对这一现象的整体认识。

主要发现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GAWAL)在2016年至2019年间每年8月至10月举办一次农业培训课程。每次培训持续五至七天，受益人群包括来自尼日利亚各州的大约400名政府官员、农民和农业专家。与此同时，由于公司的保密政策和文献资料不足，参与培训的女性小农户人数尚未披露。然而，研究显示女性小农户的参与有限。接受培训的参与者学习了种植和加工中国杂交水稻和木薯苗的技术，以及农药使用、食品加工以及各种农业机械和设备的操作。

●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对男性和女性小农户的收入和生计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小农户在培训后的收入和生计机会改善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制度壁垒、信贷获取和职业隔离等因素所致。相比之下，与女性小农户相比，男性小农户报告的产量更高，能够获得用于扩大生产的信贷服务，并参与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外包种植者计划，从而增加了收入。

●尽管直接经济影响有限，但培训增加了女性小农户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工艺的意愿，促进了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培训后，她们将新获得的技能与社区中其他小农户分享，间接促进了那些无法直接接受培训的人增加产量和收入。

●本研究揭示了与农业相关的性别规范中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尤其是一些经济作物，如小麦、小米、可可、水稻和芝麻，普遍被认为是“男性作物”。本研究的发现突显了在尼日利亚的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对女性小农户的玻璃天花板，包括她们难以获取土地、农业推广服务和信贷设施。许多女性小农户通过知识分享、经济贡献以及参与各种社区(宗教、城镇和农民)的协会等组织来解决或减轻这些限制。尽管本研究没有确立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与这些努力之间的直接联系，但研究表明通过培训获得种植水稻、小米和木薯苗等技能的女性小农户可能更有效地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从而最终提高她们的农产品产量和增加收入。

结论和建议

这项研究是一项探索性工作，从性别视角提供了对中国和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微观分析。它旨在帮助学者、活动家、中国和尼日利亚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国际农业合作对尼日利亚女性小农户的性质和影响，为他们未来在中国和尼日利亚农业合作方面的参与计划提供见解。具体来说，本研究提出了以下行动步骤：

●将性别平等融入农业领域：尼日利亚政府需要颁布新政策，促进尼日利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农业发展。尽管女性在农业和粮食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她们并未被视为农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并且对重要资源（土地、信贷和技术推广服务）的获取较少。

●在本地培训项目中增强性别意识：在尼日利亚进行的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计划的组织者需要在规划和实施培训计划时邀请当地人参与进来。培训组织者应该提供更多样化的培训项目，包括园艺和食品加工，以满足那些不想种植水稻、木薯和小米等经济作物的女性的需求。

●加强中国企业与其他农业部门利益相关者的多层次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农业企业应与尼日利亚的农业科技公司、推广人员、农民组织和社区协会等合作，增强中国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在基层的实施。农业科技公司可以提供关键的数据，了解当地社区的情况，以及需要中国主导的农业项目提供什么样的技能。此外，推广人员可以作为中方农业企业与小农户之间的沟通纽带，因为他们对尼日利亚的农业价值链和当地农民的经验了如指掌。

参考文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9年)《灵感、包容和创新：粮农组织 - 中国南南合作计划(2009-2019年)》。[\[链接\]](#)(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0日)。

郑砚秋、T.卡拉扬尼斯 著(2023年)《中国与南方国家：非洲、亚洲和拉美加勒比地区知识网络之比较分析》，社会科学理事会。[\[链接\]](#)



李明德

李明德 (Itunu Grace Ishola) 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中国学硕士项目2022级燕京学者，主修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重点是中非教育合作、人力资本开发和公共外交。她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获得汉语语言和国际教育学士学位，能说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她通过广泛的实地研究、观察和对中国各地的参与者进行采访，为中非关系领域做出了贡献。李明德是知名的北京大学非洲学生会 (PUASA) 现任副主席。此前，她曾担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联络官，负责2019年至2020年尼日利亚在华学生的事务。此外，她还是北京非洲侨民网络学术委员会成员，并担任美国非洲青年侨民组织的行政助理。



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对妇女、和平和安全的影响：对中国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和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的比较案例研究

● 帕特里夏·桑戈·波拉德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特别是在太平洋岛国地区，重点关注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对妇女、和平和安全的影响。

所罗门群岛坐落在太平洋，接近澳大利亚，人口为70多万。该国长期存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内在矛盾，阻碍了其进步。由于系统性的障碍因素，该国妇女的发展落后于男性。尽管如此，在经历一系列重大和持续的动荡后，所罗门群岛的妇女在和平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卡索、波拉德，2023年)。2019年，该国中断了与中国台湾的36年的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022年4月，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使得所罗门群岛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关注的焦点(阿科劳，2022年)。

本研究旨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与传统发展伙伴澳大利亚所签署的类似协议相比，《所罗门群岛 - 中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对所罗门群岛妇女的状况意味着什么？对她们在和平建设和安全工作中的角色意味着什么？为了收集所需信息，作者对该主题进行了广泛的文献检索，并对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代表以及当地妇女进行了非正式访谈，作为补充。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政府坚称，这项安全协议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双方的决定，旨在协助后者解决其内部安全需求。对于这项安全协议的签署，西方传统盟友以及地区和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不同的反应(阿克劳，2022年)。在所罗门群岛，该协议似乎是政府专断而签署的，因此引发了各种猜测。有人反对安全协议的必要性，认为它可能成为政治精英控制的合法化工具。而其他人则声称，根据该安全协议对该国警察和国防

的能力建设是及时的，有利于应对该国一直面临的持续动荡和带来的损失。

所罗门群岛通过了《妇女、和平与安全2017-2021年国家行动计划》(WPS NAP)，这一行动计划秉承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30号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25号决议(UNSCR 1325)的原则，该决议呼吁承认妇女在和平建设进程中的充分和平等参与。该国还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NSS)2020》，该战略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并尊重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中的所有要点。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1325号决议》的进展，逐步减少军费支出、削减武器、裁军、增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女性维和人员数量，并参与打击跨国贩卖妇女和女童(郭延军、韩志立，2022年，第284-292页)。

研究发现，尽管做出了以上承诺，但在制定《中国-所罗门群岛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过程中从未与主要妇女组织进行过任何磋商，也并没有对这个协议会对所罗门群岛妇女的日常生活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进行协调。研究还发现，妇女们对这一协定制定过程中缺乏社会组织的广泛磋商表示关注，她们对这一过程中也没有考虑到妇女在该国和平建设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提出了担忧。人们还担心使用武器可能会对妇女和儿童造成灾难性后果，就像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种族关系紧张的局势中所经历的那样(方加拉苏等，2011年)。

2017年，澳大利亚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双边安全条约，并支持所罗门群岛制定《妇女、和平与安全2017-2021年国家行动计划》。尽管澳大利亚仍然继续其承诺，支持制定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政策，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促进妇女在警察部队中担任关键领导职位，以及赋权妇女让她们能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能动性做出贡献。但是，在涉及军事和安全事务的讨论中，如何将妇女带到谈判桌边来，澳大利亚仍存在不足。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在处理与所罗门群岛的安全事务中，其做法与中国的方式如出一辙。尽管中国承诺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所有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决议，但在中国-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谈判过程中并没有包括妇女的声音。

尽管如此，目前可能存在一些机会，所罗门群岛在利用目前与澳大利亚的合作机会的同时，可以在与中国的新伙伴关系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机会包括，倡导将妇女的声音纳入包括有关军事领域在内的国家安全的讨论；主动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关

系，促进妇女的发展；利用地缘政治利益来解决该国产生动荡的根源；以及加强国家安全政策，以确保在地区安全不稳定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实现最佳结果。▲

参考文献

T. 阿克劳 著(2022年)。《重新思考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开发政策博客。[\[链接\]](#)(访问时间：2023年5月4日)。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DFAT) (日期不详)《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链接\]](#)(访问时间：2023年4月20日)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DFAT) (2021年)《澳大利亚2021-2031年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链接\]](#)(访问时间：2023年5月5日)

F. 卡索、P. 波拉德 著(2023年)《建设和平与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澳大利亚能否重建与所罗门群岛的关系?》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联盟：第11期，第1-4页。[\[链接\]](#)(访问时间：2023年4月9日)

J. 方加拉苏 等 著(2011年)《妇女的故事：妇女向所罗门群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的意见》。[\[链接\]](#)(访问时间：2023年4月21日)

郭延军、韩志立(2022年)《通过预防性外交实现持久和平》。《亚洲区域合作研究》第6卷，第284-292页，[\[链接\]](#)(访问时间：2023年5月12日)

所罗门群岛政府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 (MWCFA)《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2017-2021年国家行动计划》。霍尼亚拉：所罗门群岛。第12页。[\[链接\]](#)(2022年11月5日访问)



帕特里夏·桑戈·波拉德

帕特里夏·桑戈·波拉德 (Patricia Sango Pollard) 是所罗门群岛性别平等、妇女权利和社会包容方面的独立研究员。她拥有“所罗门群岛妇女权利行动运动”这一组织的管理经验，并在多个倡导妇女权利和儿童保护的组织里担任董事会成员。目前，她为多家所罗门群岛的地方和区域组织以及发展合作伙伴提供有关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的建议。她最近的作品之一，是于2023年与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合作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建设和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政策文件，其重点关注所罗门群岛。她于2014年从南太平洋大学毕业，获得发展学硕士学位，她的硕士论文主题是发展援助对所罗门群岛性别平等项目的影响。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
软实力参与中的
性别问题

- 高文·克尔卡尔
- 丽都·阿格瓦尔

↑ 本研究分析了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软实力参与中的性别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约瑟夫·奈(Nye)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包括了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个关键来源(奈, 2004年: 第5页)。然而, 中国对软实力的定义强调文化维度, 它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历史、道德和经济治理相结合。在中国语境下的软实力, 与奈所解释的软实力有所不同。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将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界限视为流动的, 并将它们视为相伴共生和彼此促进的。在中国, 软实力与政治稳定和社会凝聚力联系在一起(列普尼科娃, 2022年: 第52页)。例如, 中国媒体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与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和中国大学的收入增长相关联。有趣的是, 中国的软实力也考虑了国内因素, 尽管这些因素通常微妙而难以察觉。博览会和体育赛事的宏伟和奢华用来向中国公民展示, 谱写新中国的实力与繁荣。

在讨论了中国软实力的独有特点之后, 本文提出了主要的研究问题, 即性别是如何纳入中国的软实力中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层多次批评封建残余思想和父权制的社会关系, 并通过赋予妇女财产权、使之摆脱家庭控制获得自由, 以及在家庭外就业等政策, 对父权制和封建残余思想进行了纠正, 促进了妇女的社会和经济赋权。此外,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许多多边会议(例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承认了妇女的重要角色, 并承诺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然而, 对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关注并没有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

应当承认, 中国已经实现了其软实力目标, 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故事, 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表明, 人们对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自身文化和政治特点的全球大国的崛起是赞赏的。通过外交支持、投资、高等教育交流和孔子学院, 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中国已经成为学生攻读高等教育，包括博士学位的主要目的地。

尽管中国的软实力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表明，期望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自动实现性别平等是不现实的。相反，经验表明，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存在的性别从属地位和遭到的排斥，妇女仍然在奋斗。如果倾向于让性别平等湮没于一般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包括减贫项目中，而不是制定专门的应对政策，性别歧视和排斥的情况可能会延续下去。最多只会带来妇女地位的微小和边缘上的变化，象征性地实现非歧视和性别包容，而不会触动父权制的根本结构。

中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如果不对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根本性转变，妇女将无法摆脱家庭束缚，任何试图“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都可能无法如愿以偿。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关于女性的信条——妇女要尽职尽责、“宜室宜家”、妇女要恭顺、承担照料工作，这些可能会加强中国国内以及中国的全球南方伙伴国的传统的父权结构和妇女的不平等。学者对此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看看这些原则是否发生了改变或被替代，包括妇女掌握资源的权利，以及她们是否摆脱了传统家庭制度中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受到的歧视。

重要的是，中国的妇女运动和众多妇女专业组织一直在共同呼吁，在资源分配、参与决策和分担家庭照料工作方面实现性别平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多边平台上）的政策声明虽然为改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和边缘化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父权制度的规范和实践依然根深蒂固，使得这些政策很少能得到落实。这使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性别等级制度的认知和实践，那么，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希望似乎很渺茫。根本性的改变在于：第一，不再将妇女的平等视为实现减贫或经济繁荣的次要目标；第二，创造能够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策和实践的良好环境，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体系以及贸易谈判中明确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也需要实现妇女的平等和尊严，在家庭中和治理结构中摆脱大男子主义的态度。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未来是否能向世界讲述“好故事”，将取决于妇女是否具有更大的能动性，取决于妇女是否能够直接（而不是通过其家庭及男性户主）获得资源和政治决策权，取决于她们是否能够摆脱暴力并掌控自己的生活。

参考文献

J. S. 奈 著 (2004年)《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

M. 列普尼科娃 著 (2022年)《中国软实力，全球中国的要素》，剑桥大学出版社。



高文·克尔卡尔

高文·克尔卡尔 (Govind Kelkar) 是一位女权主义学者，中国政治经济学博士。她是印度社会发展委员会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她是印度“性别与发展 研究与创新中心” (GenDev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的执行主任，并在2013年5月至2020年3月曾担任美国西雅图的“农村发展研究所” (Landesa) 的高级顾问。与此同时，高文教授还担任了荷兰“能源国际” (ENERGIA International) 的国际研究协调员，以及斯瓦米纳坦研究基金会 (Swaminathan Research Foundation) 性别与能源方面的研究负责人。她是泰国曼谷亚洲理工学院的杰出兼职教师。高文教授现任中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名誉教授、德里中国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她撰写了十六本著作和许多学术出版物。她最近与人合著了《猎巫：文化、父权制和结构转型》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



丽都·阿格瓦尔

丽都·阿格瓦尔 (Ritu Agarwal) 是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她拥有德里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学位。她在尼赫鲁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云南省微观层面的土地转型，目前她正在研究省级层面，特别是云南省的转型问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农村政治经济学、城市化、财产权、性别研究以及中国的省级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阿格瓦尔博士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她是云南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访问学者。她还曾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为她的研究工作收集材料。



民间社会抗争全球
中国所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跨国民间
社会针对中国在全
球南方的基础设施
项目的倡导行动中
的性别问题

● 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

全球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中国如今是全球南方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资助者和建设者。虽然国际融资的能源项目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是这些项目已经引发了当地的、国家的和跨国的社会动员，包括要求完全停止项目的运行（希普顿、多弗涅，2021年；谢世宏，2022年；韦斯比奇，2022年）。民间社会对拟议中的项目进行争议甚至抵制的情况已经日益普遍，主要是因为大型电厂给当地社区和环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陈宝妹等，2017年；米德尔顿，2022年）。在许多情况下，女性一直处于挑战这些项目的前沿（阿马尔等，2022年）。近年来，在传统的国际发展资助机构中越来越多地考虑到性别的影响，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性别主流化这一进程虽然缓慢，但是在稳步推进（参见经合组织，日期不详）。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发电厂，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存在差异。

本文重新审视了2010年代跨国公民社会动员的典型实例，这些实例成功地在中国支持的水电和煤电项目完工之前、也就是在这些项目对当地产生全面影响之前阻止了这些项目的建设。这两座大坝分别是缅甸的密松（Myiston）大坝和柬埔寨的柴阿润（Cheay Areng）大坝，以及肯尼亚的拉穆（Lamu）煤电厂。通过重新审视在两个不同地区（东南亚和东非）的、学者和活动家普遍认为“成功”的跨国动员实例（基尔赫尔，2018年；约番东，2020年；查特，2022年），本文对以往这些社会动员的动态过程（包括参与者、议题框架和战略）进行了比较，并评估了在这些众人瞩目的跨国运动中是怎样考虑和关注性别议题的。

与此同时，以往这些挑战中国投资的全球南方项目的跨国动员实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关研究和政策洞见。首先，国家层面的行动者，特别是当地社区（许多是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和环境非政府组织（NGO），率先发起并领导了对大型电力项目的抵制。他们的国际盟友，主要是从事环保倡导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随后支持这些国内团体，使这场争论成为跨国事件。其次，在这些抗争中公民社会团体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策略。

虽然动员主要集中在使“东道国政府”改变既往的政策决定，但是只要有可能，他们也和中国的利益相关者（政府、金融机构和建筑商）和其他国际投资者进行接触。第三，公民社会的行动者主要围绕项目的环境风险、危害和影响来进行组织动员和开展活动。虽然其间也提出了人权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社区权利的问题，但是跨国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对性别问题视而不见。在本文所分析的所有案例中，对项目给妇女权利、生计和健康、性别不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带来的影响很少加以关注。第四，对中国的民间社会的行动者来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关于这些“有争议的项目”的倡导活动中去，特别是那些在东南亚的项目，而不是公开参与对抗性的跨国抵制运动。他们收集当地的信息、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他们的倡导工作主要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问题，在性别有关的议题上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盲点。最后，这些跨国倡导中没有突出性别问题，以及缺乏中国民间社会的声音，并不意味着性别问题和中国民间组织不存在。相反，出于各种原因，包括这些组织机构自身的政治和策略，并没有在公开声明和倡导文件中优先考虑性别议题和中国民间组织的声音。

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在中国投资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背景下，与性别有关的民间社会跨国行动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批判性地揭示了这些在其他方面堪称“成功”的跨国动员中切实存在的两个盲点：缺乏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以及缺乏中国盟友的参与。本文最后就如何加强跨国联盟提出了建议：这些联盟应该对性别问题更加敏感，并且在今后应该更加包容来自中国的声音。要做到这些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与中国境内机构之间的联系和促进中国境内机构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中国境内的机构很多从事环保运动，它们业已积极地监督中国境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了。扩大这些联盟可以在“全球中国”的背景下搭建起性别与环境议题之间的桥梁，帮助全球南方的民间社会团体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国情，并与中国本土的行动者交流合作，侧面支持这些中国团体在国内的倡导努力。在“全球中国”背景下打造新型的“内外合作”（参见福克斯和布朗，1998年），有助于劝阻中国的利益相关者在较早的阶段就避免计划、资助和建设那些“有争议的项目”，从而避免在项目下一步的执行过程中遭到当地的抵制使项目受阻。将更多的声音纳入对话，包括倾听来自“东道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妇女组织和性别问题专家的声音，也可以确保性别议题在未来与“全球中国”有关的跨国动员中获得更多关注。 ▲

参考文献

P. 阿马尔、罗丽莎、M.A. 维泰里、C. 费尔南德斯-萨尔瓦多、F. 布兰科利 编 (2022年) “简介：中国走出去、亚马逊生物群落和南美民粹主义”，载于《热带丝绸之路：中国在南美洲的未来》，第1-40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S. 查特 著 (2022年) “柬埔寨中国投资项目的争议：柴阿润水电项目案例”，载于《亚洲研究评论》，第46卷第1期，第19-35页。

J. 福克斯、L.D. 布朗 编 (1998年) 《问责制的斗争：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和草根运动》。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J. 基尔赫尔 著 (2018年) “反对建水坝运动的成功策略：来自缅甸和泰国的证据”，载于《社会与自然资源》，第31卷第2期，第166-182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期不详)《基础设施中的性别问题》。[\[链接\]](#)(访问日期：2023年7月11日)。

C. 米德尔顿 著 (2022年) “全面审视湄公河流域大型水电大坝的政治生态学”，载于《水替代方案》，第15卷第2期，第251-289页。

谢世宏 著 (2022年) “民间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多方面反应”，载于《全球中国脉动》，第1卷第1期，第99-109页。

L. 希普顿、P. 多弗涅 著 (2021年) “针对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全球南方的矿业项目的跨国倡导的政治”，载于《环境与发展杂志》，第30卷第3期，第240-264页。

陈宝妹、F. 厄本、G. 芒 著 (2017年) “参与亚洲和非洲大型水电项目的中国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评估”，载于《中国季刊》，第230期，第464-488页。

L.T. 韦斯比奇 著 (2022年) “‘我们想要的银行’：中国和巴西的活动家们围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倡导行动”，载于P. 阿马尔等 编著《热带丝绸之路：中国在南美洲的未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190-203页。

P. 约番东 著 (2020年) “中国与水电开发的问责政治：湄公河地区跨国倡导网络的有效性如何？”，载于《当代东南亚》第42卷第1期，第85-117页。



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

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Laura Trajber Waisbich)是一位南南合作专家。她在发展、外交政策和人权领域拥有十多年的研究和政策经验。她是一位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拥有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她目前是英国牛津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的讲师和拉丁美洲中心巴西研究项目的主任。她还兼职于三个巴西智库：南南合作研究和政策中心(Articulação SUL)、巴西分析和规划中心(CEBRAP)以及伊加拉佩研究所(Igarapé Institute)。

2024年2月出版

本期编辑团队

蔡一平
Sharan Sindhu
Matthew Gill (英文审校)
张丽珍 (中文翻译)
杜 斌 (中文排版)

DAWN 执行委员会

蔡一平
Claire Slatter
Corina Rodríguez Enríquez
Flora Partenio
Gita Sen
(共同协调员)
Kamala Chandrakirana
(共同协调员)
Kholoud Al-Ajarma
Kumudini Samuel
María Graciela Cuervo
(共同协调员)
Masaya Llavaneras Blanco
Vanita Mukherjee

DAWN 理事会

Lydia Alpizar
Fatou Sow
Sandra Tarte
Sonia Corrêa
Tara Chetty
Vivienne Taylor
(理事会主席)

DAWN 全球秘书处

行政官

Sharan Sindhu

财务官员

Nailagovesi Vakatalai

项目协调官员

Lillian Bing

行政 / 项目 官员

Kajal Matthew

行政 / 财务助理

Ana Rakacicaci

研究官员

Sala Welelakeba

助理财务官员

Simran Singh

传播官员

Ricardo D' Aguiar

网络传播官员

Leda Antunes

传播协调官员

Giulia Rodrigues

设计主管

Marla Rabelo

设计助理

Raquel Cappelletto

如需下载往期的
DAWN 简讯,
请点击这里



DAWN 简讯

DAWN 根据 2024 年知识共享协议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NC-ND 4.0)
享有版权

请在线关注我们



📍 全球秘书处, JP Bayly Trust Building, Level 2,
193 Rodwell Road, 苏瓦, 斐济。

🌱 为了保护环境, 请尽量避免打印本出版物。



致 谢

DAWN 衷心感谢为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开发和案例研究审稿做出贡献的项目顾问。

Peggy Antrobus

黄思然

T. Tu Huynh

Susie Jolly

李英桃

刘海芳

Claire Slatter

张传红

于音和张丽珍对本项目研究框架的开发和项目协调做出了贡献。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